

●张 觉

《商君书》、《申子》、《慎子》流传考略

商君主法,申子言术,慎子尚势,鼎足而为先秦法家三大派系,至韩非而总其大成。三家著述,韩非皆有称道,但《商君书》、《申子》、《慎子》之流传却不如《韩非子》幸运。今略述于下,供研究者参考。若有疏漏处,谨祈方家补正。

《韩非子·五蠹》云:“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韩非子·内储说上》还引过公孙鞅的话,可见《商君书》在战国时已广为流传。《淮南子·泰族训》言及“商鞅之《启塞》”,《史记·商君列传》曾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可见该书在西汉也有传本。但那时所传《商君书》有多少篇,则无从考见。班固根据刘歆《七略》作《汉书·艺文志》,其诸子略法家类著录“《商君》二十九篇”。由此可以想见,战国至秦汉所传的法家《商君书》当为二十九篇本。《汉书·艺文志》兵家类另著录《公孙鞅》二十七篇。可见商鞅还有军事著作,但后世无传。

汉代以后,卷子逐渐代替了编简,著录多称卷而不称篇。如《隋书·经籍志》子部法家类著录“《商君书》五卷”(《四库全书·商子提要》认为“其称《商子》,则自《隋志》始也。”实非。),《旧唐书·经籍志》丙部法家类著录“《商子》五卷”(此则称《商子》之始),《新唐书·艺文志》丙部法家类著录“《商君书》五卷”,又注曰:“或作《商子》”(此则两称之始)。隋、唐之志皆仅录其卷数而不著其篇数,故隋唐时此书有无缺篇,不得而知。不过,从今传唐

代魏征等所辑之《群书治要》来看,其卷三十六摘录了商鞅《商君子》之《六法》、《修权》、《定分》三篇文字。今本《商君书》二十六篇中无《六法》篇。由此推想,则唐代《商君书》可能尚未亡佚。

《商君书》传至宋代,始有散佚。宋郑樵《通志·艺文略》法家类著录“《商君书》五卷”,注云:“秦相卫鞅撰,汉有十九篇(觉按,当作‘二十九篇’),今亡三篇。”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法家类亦著录“《商子》五卷”,注云:“所著本二十九篇,今亡者三篇。”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亦于法家类著录“《商子》五卷”,且云:“秦相卫公孙鞅撰,或称‘商君’者,其封邑也,《汉志》二十九篇,今二十六篇,又亡其一。”可见此书至宋时已有亡佚,仅存二十六篇,而至宋末又亡一篇(所亡者可能是第二十一篇),仅存二十五篇。

这里值得另加说明的是:《四库全书·商子提要》云:“陈振孙《书录解題》云‘《汉志》二十九篇,今二十八篇,已亡其一。’晁公武《读书志》则云:‘本二十九篇,今亡者三篇。’《读书志》成于绍兴二十一年,既云已缺三篇,《书录解題》成于宋末,乃反较晁本多二篇,盖两家所录各据所见之本,故多寡不同与?”这《提要》,实是根据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十二之误文《书录解題》之“二十六”被误为“二十八”而误说之,不足征。但后世的校勘家却往往重蹈覆辙。如严万里《商君书总目》附记曰:“《读书志》:‘今亡者三篇。’《书录解

题》:“今二十八篇,又亡其一。”是宋本实二十六、二十七篇。”其《商君书附考》又云:“《直斋书录解题》杂家类:《商子》五卷,秦相卫鞅撰。《汉志》二十九篇,今二十八篇,又亡其一。”严万里《商君书附考》之文多抄自《文献通考》,此文不但承《通考》之误,更妄增“杂家类”之名,误上加误。《商君书附考》就云:“《文献通考》经籍杂家:《商子》五卷。《宋史·艺文志》杂家类:《商子》五卷。”此处“杂家”实应正之为“法家”。《四库全书提要》颇具权威,而严万里本又以精校之称大行于世,所以后人往往不加细究,承用此类误说,实令人遗憾。关于这点,可参朱师辙《商君书解诂·初印本自序》和高亨《商君书注释》中之《商君书作者考》等。今附记于此,以免再以讹传讹,谨望读者留意。

宋刊本到清代也早已亡佚。清代人所见到的《商君书》的最早版本为元刊本。乾隆时严万里(即严可均,朱师辙《商君书解诂》有考证)得元刊本,始《更法》,止《定分》,为二十六篇。但其中亡佚两篇,一篇尚有篇名篇次,仅亡篇文;另一篇则仅存篇次而亡篇名篇文。所以,实为二十四篇,比宋代郑樵等人所看到的更加少了。但其篇数仍与宋时相合,那么宋本之二十六篇于此也可见其大概了。严万里对此本很重视,故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取明代范钦本、秦四麟本加以校正。光绪初年,浙江书局刊印《二十二子》,其中的《商君书》便取严万里的这个校本校刻,人们习称之为“严万里本”、“严校本”或“严本”。其实,若正其名,当称为“浙江书局本”或“二十二子本”,因为它并不是由严万里校刻的。由于浙江书局的刊印,这严万里所校改过的元刊本成为以后最流行的《商君书》读本。不但孙诒让作《札迻》、陶鸿庆作《读诸子札记》等皆取此本,就是本世纪刊行的各种《商君书》读本,如世界书局1935年缮印《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36年辑印《四部备要》,也都取此本重刊。本世纪的各种注本,也大多以此为底本。1986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影印了浙江书局的《二十二子》,所以这种本子现在很容易见到。元刊本现已失传,所以严万里的校雠与浙江书局的刊印对《商君书》的流传起了很大的作用。这里值得补充的是,严万里除了在乾隆时校过此书外,又于嘉庆十六年(1811)校定过元刊本。由于这重校本后世未刊,所以影响不大,现在上海图书馆还藏有一个严氏重校本的传抄本。

元刊本经校改与重刊,当然只能称之为清刻本了。所以,流传至今的《商君书》最早版本,只有明刻本了。明代《商君书》的全刻本与选本、评本甚多,可考见的有:范钦本(即天一阁本,在范钦所编《范氏奇书》中,刊于嘉靖年间,今收入《四部丛刊》,甚易见到),冯覲本(即冯覲《商君书评校》,刊于嘉靖三十八年),冯梦桢本(又称绵眇阁本,在冯梦桢所编《先秦诸子合编》中,刊于万历三十年),吴勉学本(在吴勉学所编《二十子》中,刊于万历年间),程荣本(在程荣所编《汉魏丛书》中,刊于万历年间),秦四麟本(刊于万历年间),朱蔚然本(在《合诸名家批点诸子全书》中,杨慎评、顾起元释、朱蔚然订,刊于天启年间),归有光本(在归有光所编《诸子汇函》中,刊于天启六年),陈仁锡本(在陈仁锡所编《诸子奇赏》及《续文苑英华》中),王志远本(在王志远所编《诸子合雅》中,故又称合雅本),陈深本(在陈深所编《诸子品节》中,故又称品节本),郑子龙本(在郑子龙、方疑批点的《十二子》中),陆可教本(在陆可教、李廷机的《诸子玄言评苑》中),张邦翼本(在张邦翼所选的《汉魏丛书选》中),李元珍本(在李元珍《诸子纲目类编》中),李云翔本(在李云翔《新镌诸子拔萃》中),等等。

清代的《商君书》版本,今传不多。容易见到的除上述浙江书局本外,主要有二种:一是四库全书本,一是光绪纪元(1875)湖北崇文书局刊行的“子书百家”本。198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了《文渊阁四库全书》,《商子》载

第729册,所以现在四库全书本十分容易见到。须说明的是,朱师辙校《商君书》时也用过四库全书本,但并非此本,所以其校语中所述文字与此书不尽相同。

本世纪流传之《商君书》,除翻印浙江书局本外,又有一些注释本问世。较早的注本有王时省(王时润)的《商君书斟诂》,该书为闻鸡轩丛书第一集,1915年,长沙宏文图书社刊行。该书流传不广,北京图书馆原存二部,今已亡其一。王书时有发明,每为后人引用,但失误亦多。简书1928年冬撰《读商纠缪》,专攻王著之瑕。其后简书又据严万里校本,取证范钦本,综合俞樾、孙诒让、王时省诸家之说,参其《读商纠缪》,编成《商君书笺正》,于1931年由上海民智书局刊行。除《斟诂》、《笺正》外,1935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陈启天的《商君书校释》。但本世纪用力较深、影响较大的注本当推朱师辙的《商君书解诂》。该书最初于1921年由上海广益书局刊行,1935年由华西协合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再版,后来作者重加增订,1948年由中山大学出版组出版了《商君书解诂定本》,1956年古籍出版社又据广州本重排出版。除了严校本外,这是当今印行次数最多的《商君书》读本了。不过,该书虽几经校正,仍不免有误。近来,又有一些注本问世,如高亨的《商君书注译》,山东大学的《商子译注》,蒋礼鸿的《商君书锥指》,这些都极易见到,故不赘述。

《商君书》与《申子》、《慎子》相比,要幸运得多。《申子》之言,《韩非子》也多引述,但战国时《申子》的流传情况却显然不象《商君书》那样“家有之”,所以韩非没有道及其流传情况。《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云:“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裴骃《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曰:“今民间所有上下二篇,中书六篇,皆合二篇,已备,过太史公所

记。”司马贞《史记索隐》云:“今人间有上下二篇,又有中书六篇,其篇中之言,皆合上下二篇,是书已备,过于太史公所记也。”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略》云:“《申子》三卷也。”《汉书·艺文志》则于诸子略法家类著录《申子》六篇。凡此种种,可知《申子》在汉代始传二篇,后又分为六篇,魏晋南北朝以后盛行卷子,又分为三卷。但《隋书·经籍志》于子部法家类“《商君书》五卷”下却云:“梁有《申子》三卷,韩相申不害撰,亡。”不过,《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又在法家类著录申不害所撰“《申子》三卷”,而唐时所成之各种类书及宋时所成之《太平御览》、《孔子集语》皆引有《申子》之文,可见此书至唐宋时尚未亡佚。今又考宋郑樵《通志·艺文略》与《宋史·艺文志》,皆无著录,则该书或至南宋时已逐渐散逸。

元明以还,此书失传,人们仅可从宋以前读书之引文中略见《申子》之片言只语。要阅览《申子》之文甚为困难,幸好有人作了些辑佚工作,为《申子》之流传作出了贡献。其中最主要的有如下两家。

一是清代的马国翰,他从战国时韩非所著的《韩非子》、吕不韦所编之《吕氏春秋》、唐代欧阳询等所编的《艺文类聚》、虞世南所编的《北堂书钞》、马总所辑之《意林》、徐坚等所编的《初学记》、《文选》李善注、司马贞《史记索隐》、白居易《六帖》、北宋李昉等所编的《太平御览》、南宋薛据所辑之《孔子集语》等书中辑得《申子》佚文二十四条,刊于《玉函山房辑佚书·子编法家类》。这是现在所能见到的较为详尽的《申子》辑佚之作了,可惜的只是其中错字较多,而且漏收了唐代魏征等所辑之《群书治要》的引文。

二是严可均,他所编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四也辑有《申子》佚文。他收辑的佚文与马氏所辑互有得失,故两者可互相补充。但严氏将《群书治要》之引文割裂开来,则未足称道。所以,欲研究《申子》,除了披阅

马、严两家所辑之外,最好能再直接披阅《群书治要》,该书卷三十六录有申子之《大体》篇,其篇章虽未必完整,但其篇幅远胜于马、严所辑诸条,值得一读。

明初陶宗仪所辑《说郛》卷六《读子随识》、清代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李宝沚《诸子文粹续篇》也都辑有《申子》之文。而民国时王时润所辑《申子逸文》一卷,作为《商书君斟论》的附录之一则较上述各家为详尽,可惜流传不广。

《申子》之流传情况仅此而已。在此值得补充的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申子》六篇,未存其目。据《群书治要》,则知其中有《大体》篇,至于其它篇目,可考见者唯二:一曰《君臣》篇,一曰《三符》篇。《太平御览》卷二百二十一引刘向《七略》曰:“孝宣皇帝重申不害《君臣》篇,使黄门郎张子乔正其字。”《汉书·元帝纪》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云:“申子学号‘刑名’。刑名者,以名责实,尊君卑臣,崇尚上抑下。宣帝好观其《君臣》篇。”由此可知《申子》有《君臣》篇。严可均所辑佚文有题“君臣”篇者,不知是否还有其他根据。《淮南子·泰族训》:“今商鞅之《启塞》,申子之《三符》,韩非之《孤愤》,张仪、苏秦之从衡,皆掇取之权、一切之术也。”《论衡·效力》:“韩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盖十五年。不能用之,又不察其书,兵挫军破,国并于秦。”其余三篇,则尚无从考见焉。

《慎子》之流传,虽不如《商君书》,但较《申子》为强。《韩非子》中已引述过慎子的话,可见《慎子》在战国时已有流传。《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慎到,赵人,……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十二论乃发明黄老道德之术,则当为道家言。然其所著书乃言治乱之事,故刘向又将其列于法家,与《韩非子》同。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法家类著

录“《慎子》四十二篇”,较《史记》所记为多,大概是汉时征求遗书,所以校定本有所增益。以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于法家类著录“《慎子》十卷”,唐马总《意林》又云“《慎子》二十二卷”,皆不言其篇数,故隋唐之时,此书有无缺篇,不得而知。观其卷数尚富,谅亦无所亡佚。到宋代,此书亡其大半,仅存十分之一。宋王尧臣等所撰《崇文总目》法家类著录“《慎子》一卷”。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五(宋赵希弁《附志》)诸子类亦著录“《慎子》一卷”。宋郑樵《通志·艺文略》法家类著录“《慎子》一卷”,注云:“战国时处士慎到撰,旧有十卷。汉有四十二篇,隋唐分为十卷,今亡九卷三十七篇。”宋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卷六法家类云:“《汉志》四十二篇,今三十七篇亡,唯有《威德》、《因循》、《民杂》、《德立》、《君人》五篇,滕辅注。”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法家类著录“《慎子》一卷”,其言云:“赵人慎到撰,《汉志》四十二篇,先于申、韩,称之。《唐志》十卷,滕辅注。今麻沙刻本才五篇,固非全书也。……《崇文总目》言三十七篇。”陈氏谓“《崇文总目》言三十七篇”,实误,但后人往往循此误说。今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所载《崇文总目》,仅著录“《慎子》一卷”,未云篇数。既为一卷,谅亦不足“三十七篇”,所以陈氏此语中之“言”字,当为“今亡”二字之讹。《崇文总目》原文当为“今亡三十七篇”,否则怎么会仅存一卷呢?今略陈管窥蠡测之见于此,谨望读者深考焉。总之,宋代《慎子》已亡九卷三十七篇,仅存一卷五篇,所以元人所撰《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亦皆于法家类著录“《慎子》一卷”。

自元明以还,所传《慎子》之版本可归纳为三类:

其一为一卷五篇本,所存篇目与王应麟所言同,盖即宋本之旧。明初陶宗仪所辑之《说郛》,其卷四十即录有此本,注云“一卷全”。其后,万历五年(1577)周子义等所刊《子

汇》中之《慎子》、光绪元年(1875)湖北崇文书局所刊《子书百家》中之《慎子》，亦皆五篇本，不过另附潜庵子从马总《意林》中所辑出之佚文十二条(《意林》卷二原录有《慎子》十三条，潜庵子并为十二条)，所以比《说郛》本有所增加了。至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所校《四库全书》中的《慎子》，则除残存五篇及《意林》十二条外，还有所谓载《文献通考》之《慎子》佚文二十条，又比《子汇》本增多了。《四库全书·慎子提要》以为此本乃“明人据拾残剩，重为编次”之书，甚是。至于姚际恒《古今伪书考》、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证》疑五篇本为伪书，不足信。该本与唐代《群书治要》所引多合，实不容置疑。

其二为一卷七篇本，此乃清人据唐时类书辑补之本。清严可均曾从《群书治要》抄出七篇，此即“四录堂本”《慎子》，因未刊行，故无甚流传。现通行之七篇本为钱熙祚所校之《守山阁丛书》本。钱氏据唐宋类书补充明本之不足，校正明本之讹误。不但依《群书治要》增补了《知忠》、《君臣》两篇，而且于原刻之五篇亦依唐宋类书之引文多所补正，又依各书引文辑成《慎子逸文》附于后。正如钱氏《慎子跋》所云：“搜罗略备矣。”至于旧本所谓载《文献通考》之逸文，钱氏亦具加考查，凡从类书中可检得者，则加注明；检而不可得者，虽疑其杂取《鬻子》、《墨子》、《韩非子》、《战国策》之文而成，但亦姑且存之。所以钱校本不仅包容了宋以来所传之五篇残本，而且亦尽量收罗了唐宋时各书之引文，实为《慎子》之最佳校本。该本自道光二十四年(1844)刊行后，流传甚广，鸿文书局、博古斋、中国学会皆影印过道光本。1935年世界书局编印《诸子集成》、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印《丛书集成初编》、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编印《四部备要》，皆取钱校本予以重刊。

其三为内外篇本。此本出现于明代万历年间，为吴兴慎懋赏编辑校刊。今易见者有二：

一为中国学会1928年影印之《慎懋赏注慎子内外篇》，为《慎子三种合帙》之一，与原刻全同，其篇次为：慎懋赏《慎子序》，王锡爵《慎子序》，慎懋赏《慎子传》、《慎子考》及其所辑之《慎子评语》，《慎子内外篇》及其《直音》，《传补》，汤聘尹《慎子后序》。二为上海涵芬楼影印之江阴缪荃孙藕香簃抄本，即四部丛刊本，此本抄自万历本，但无前本之序、传、考、评语、注解、直音、传补等，而除《慎子》内外篇外，尚附有缪荃孙所辑之《补遗》与《逸文》，以及孙毓修之《慎子内外篇校文》和《跋》。不过其补遗与逸文乃采自钱校本而略加删削，未足称道。慎懋赏本《慎子》，于明代突兀而出，令人生疑。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卷一第二章以为此书“显系慎懋赏伪造，为同姓人张目。”其后，罗根泽作《慎懋赏本〈慎子〉辨伪》(载《燕京学报》第六期，后编入《古史辨》第四册)，证其为伪。罗氏更作《慎懋赏〈慎子传〉疏证》(亦收入《古史辨》第四册)，证慎懋赏之“《慎子传》全非事实，而与其《内外篇》相依为命。”

明代郑子龙、方疑所编《十二子》、李元珍所编《诸子纲目类编》、陈仁锡《诸子奇赏》、李云翔《新镌诸子拔萃》、清代张海鹏《墨海金壶》、李宝淦《诸子文粹》、王仁俊《经籍佚文》中皆刊有《慎子》之文，因未见其书，故暂付阙如。

总之，今传《慎子》以钱熙祚校本最为完善，至于各种五篇本及其所附逸文、四部丛刊本所附“补遗”、“逸文”，乃至唐宋类书之引文，钱校本收罗殆尽。所以，现今的《慎子》翻印本都以钱校本为底本。至于慎懋赏校刊的《慎子内外篇》，乃慎氏据《慎子》残本及各书所引《慎子》之文编制而成，其间真伪混杂，仅可略备参考而已。

(作者单位：上海空军政治学院。)

来稿时间：1990.6。编发者：刘喜申。)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ystem should form a single entity. Broadly speaking the document information science included the library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with 8 charts.

The service of th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A single entity.

The library science----Evolution.

The document information Science----Research.

G256.

The Pening on the Research Method of the Library Science/Li xichu//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China Society of the Library Science. -1991, 17(1). -77~79

The research methods are of important service to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It was a pressing obligation to open up the research methods and complete the systems of the method in the library science for the researchers of the library science. This article expounded the function of the mathematical methods, systematic methods and experimental methods on the library research, and the problems when apply them, and emphasized the experiment of library was a main standard to decide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the library science.

The library science----Research methods

The mathematical methods----Apply

The systematic methods----Apply

G25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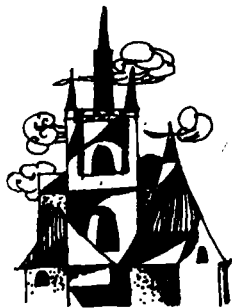
Researches on the Circulation of "Shang Jun shu", "Shen Zi", "Shen Zi"/Zhang Jue//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China Society of the Library Science. -1991, 17(1). 81~85

Shang Jun(商君), Shen Zi(申子), and Shen Zi(慎子) were personages of legalist in Pre-Qin. "Shang Jun Shu" was spread in Warring states, and was lost in Song dynasty. The old edition the person saw in qing dynasty was the edition of Yuan dynasty, and then the oldst edition of "Shang Jun Shu" that was spreading at present was the edition of Ming dynasty. The most influential edition notes to the "Shang Jun shu" was "Shang Jun shu Jie gu" of zhu shizhe in this century. "Shenzi" was lost in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ma Guohan and Yan Kejun in Qing Dynasty made the works of collecting for it. "Shenzi" could'nt have been lost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only there are a tenth part of "shenzi" in song dynasty. The best edition of "Shenzi" was the edition of "Shou shan Ge Cong Shu" proofreaded by Qian Xizuo at present, it was the edition in seven volumes.

The old-rare books----Pre-Qin

The edition----Proofread

G256. 3



(周钰萍、予文译校)